

孙郁系列

Bei Xiedu de Luxun

孙郁 编 梁实秋等 著

被亵渎的鲁迅

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形象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周围人中，可以分成几个类型，十分复杂，更不用说这些作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鲁迅形象了。鲁迅的思想具有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其思想是超越时代的，一些拙劣的志士，企图用鲁迅的思想来解释，这是不可能的……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孙郁系列

Bei Xiedu de Luxun

孙郁 编
梁实秋等 著

被褻渎的鲁迅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褻读的鲁迅/孙郁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21 - 08434 - 7

I. 被… II. ①孙…②梁 III. 鲁迅著作 - 文学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258 号

被褻读的鲁迅

主编:孙 郁

作者:梁实秋等

责任编辑:杜培斌 张忠兰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50004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贵阳天济彩色印务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59 千

印张:14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书号:ISBN 978 - 7 - 221 - 08434 - 7/I · 1758

定价:29.80 元

序

我在多年前，就曾想把此书编出来，然而俗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编辑此书的缘起，不是别的，而在于想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鲁迅生前在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供世人一阅。《三闲集·序言》云：“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再次提起此事：“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鲁迅逝世半个余世纪了，然而这样的书一直未能问世。现在，与鲁迅先生有过纠葛的人，大多已经作古，我们总算可以静下心来，爬梳历史的旧迹。有这样一本否定鲁迅的集子在，可以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先生的价值。倘一味只读那些赞佩的书，青年人或许不大会理解这些结论的由来。只要细心读过此书和鲁迅的书的人，其结论就不言而喻了。

我一直觉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它的内在含义是深广的。“五四”后，中国重要的学人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而冲突者颇多。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冯乃超、阿英、施蛰存等，与鲁迅均有过不快的历史。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纯属个人恩怨的，如：周作人、高长虹等；有的属于精神上的冲突，认识世界与审美层次的不同，使鲁迅一时陷入众人围攻的境地。凭心而论，本书搜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在学术上可以略作讨论外，大多数都不免幼稚甚至谬误百出。这些人与鲁迅的冲突，实际上表现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诸种思潮相撞的特点。有比较，才能见出真货色来，细

品本书的文章,会让人重温本世纪二三十年文化风潮的影子。读了高长虹、阿英、郭沫若等人的文字,你会感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文风,实在不是一个凭空的造物。偏激狂热的文化风潮,在本世纪初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我有时想,鲁迅被众多的人误解和褻读,不是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巨人出世,开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稣,生前受的磨难真是不可胜数。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的人物。与上述诸人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他的婚恋不幸、兄弟失和、被免职、被通缉等,实在也是不如意得很。鲁迅是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拒绝的人,他少有传统士人的中庸、柔弱,因为对人生与社会想得透彻,官方与民间,都不接受他。先生越是被拒绝、被否定,在今天看来,越显示出他的价值来。他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对被几千年旧文明浸泡的中国人的病体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泻药。

鲁迅的一生曲折复杂。他早年丧父,后又多受内外部厄运的刺激,是深味生命之苦的。一九二四年,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谗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分手。这件事,对先生是个不小的刺激。虽然后来二人均缄口不语,但兄弟间的结怨,在鲁迅内心是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鲁迅常常以真心待人,但有时得来的却是相反的报答。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曾帮他走向文坛,为编校高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夜间竟吐了血。但后来有个时期,高长虹个性变得极端不近人情。一九二六年,鲁迅赴厦门后,《莽原》半月刊杂志社内部出现磨擦,高长虹逼迫远在南国的鲁迅表态,由于鲁迅不明底细,一直沉默着。结果招致高氏的狂轰滥炸。他先后写出《走到出版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等文,大肆攻击鲁迅。后又在文中暗示,鲁迅夺了他的爱,并以诗喻之。高长虹的单相思而惹出的对他人的的人身攻击,大多为病态之语,其文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在这里,倒是可见出鲁迅的大度。鲁迅后来在作品中,多次指出那些忘恩负义者的可鄙。在小说和杂感中,偶尔以笔还击,《故事新编》中的某起细节,留下了那时的心绪,上述两件事,算是个人间的恩怨。我们不妨说,这里有气质和人格上的差异,文化上的磨擦,虽然并不是直接导因,但此种褻读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我在读他对叛徒的愤慨的文字时,就时常为先生的苦衷所震动。爱而得仇、善而获怨,这是人生的不幸,对此,先生的体悟,大概比常人都要深厚的。

但最使先生不快的,或者说占去了他一生许多精力的,是他与自己的敌人或不同路者的论战。先生的一生,一直未能摆脱此种纠缠。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

的,数量很多。其中有赤膊上阵与他正面较量者,亦有躲在林中施放冷箭的。我觉得这里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等人的不快事件;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内部的抨击或批评。在与上述诸人诸集团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失度的地方。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是很少有辱骂之句的,先生在愤怒之极时,亦不过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但绝不说里巷俗语。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

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我以为这些文章,是有社会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层次和社会团体,与鲁迅都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隐含着什么呢?是文化的交锋还是气质上的抵牾?我想,当代青年人看了这些文学,稍有头脑,当会反省。批评家们大概也可以在此得出教训:武断是批评的大忌。从鲁迅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所进步了呢?一部围剿鲁迅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影,它多少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人中,建立一种科学的批评精神,是多么重要的任务。

二

最初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陈西滢、章士钊等人。一九二四年底,北京女子师大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五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七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

“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在文章中，似乎以“公允”的口吻为当局辩护，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以此为导火线，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也许是鲁迅的笔锋刺中了陈氏的要害，于是不惜用大量笔墨，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人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

……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

接着陈西滢诬陷鲁迅抄袭别人的著作成果，他说：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写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陈西滢加给鲁迅的这顶罪名，不久就被别人澄清，胡适等人后来就指出陈西滢的错处。由于陈西滢在论战中被对方所激，因此行文中多讽刺之意。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到了鲁迅作品的成就：“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貌似公允，其实夹带了极不友好的态度，他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实际上露出了他狭隘的世俗意识。

鲁迅与陈西滢的恩怨，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的个性主义意识，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陈氏的许多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中国知识阶层，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在这类人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上层知识界的要害的东西。他觉得，在

“正人君子”那里，蕴含着可怕的劣根性；绅士阶级的人生态度，以及维护“公理”的精神意志，是中国腐败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他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许多幽默、冷酷甚至不尽人情的文字，显示了鲁迅先生孤傲伟岸的性格。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绪，对当代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女师大风潮之中，鲁迅不仅受到知识界某些人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当得知鲁迅同情学生，并且通过舆论等方式声援学潮后，被激怒了。章士钊认为，作为教育部的官员，直接参与学运，是有悖于政府官员身份的。我们现在读章士钊免鲁迅职务的文字，其感慨定会不小吧！鲁迅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后来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的举措，是很有气魄的。他与官僚者的周旋所表现的智慧和胆识，是同代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他屡遭厄运的一个原因。因此，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尔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是可笑的。人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除了反抗还有什么呢？在《我还能“带住”》中，他写道：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这种异于常规的反抗情绪，看似离经叛道的，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爱的情感是深的。惟其懂得爱，恨的时候才不留情面。鲁迅的冷酷深刻，要么是使对手服服贴贴，要么使耍赖而恶态相报。这大概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三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京南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一年起，他不断卷入各种文化风潮和某些个人的争辩中。先是高长虹发难，后与顾颉刚有隙，在厦门和广州，不快之事未曾间断。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对鲁迅的刺激是深重的，他曾形容自己被血的现实“吓得目瞪口呆”。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想从此结束“自我流放”的生活，并专心致志地从事译著工作。

事情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顺利。在后来定居上海的十年生活中，他一直未能摆脱被围剿与谩骂的环境。即使在他心境最佳的时期，也依然没有躲开各种势力的干扰。

刚到上海时，鲁迅的确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渴望尽快找些新的朋友，与他们在文坛上认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创造社的朋友郑伯奇、段可情来访时，他的高兴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曾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先生觉得，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在文艺方面是用力的。鲁迅内心深处，隐隐地对创造社有一种期待。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是创造社一些左倾青年，最早向他发起了讨伐。在与鲁迅进行周旋的所有集团之中，创造社的声势最大，对鲁迅晚年心态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创造社是一个青年文艺团体，早期主张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的生命意志和自我情绪的表现。其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以自己的真诚的情感，震动过许多读者的心。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对这些人的印象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还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气质，他们在受到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后，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尤其是在成仿吾等人的眼里，旧有的文化人士已衰老了，只有他们这些代表先进观点的青年，才能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于是，从一九二七年起，成仿吾等人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始对鲁迅等人进行批判。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中写道：

“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 L. Tolstoy 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接着，李初梨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推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对鲁迅等人进行理论上的发难。他们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文坛来说，的确吹进了一缕新风，新的概念、新的认知范畴、新的认识视角，使许多人感到既新鲜，又莫名其妙。成仿吾等人的理论的出现，大有除旧布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势，似乎旧的文学意识与表现方式已经过时了。

鲁迅也被这些人的理论所“惊呆”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理念世界，这里的满溢着火药味的观念，使他感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再也不那么单调了。可是，凭着直觉，他感到，这些气势逼人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射中中国社会的要害，除了朦朦胧胧的概念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他无法接受这些远离尘世的理论演义，何况这里充塞着过多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呢。

他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些狂妄的青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些轻浮的青年理论只是建在沙漠上。

在这一年三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他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鲁迅指出，成仿吾等人的理论，其实还是远离现实的朦胧的东西，创造社过去还在“艺术之官”里，现在突然转向革命。鲁迅认为，搞文艺的人是敏感的，而且生怕自己的没落，于是不得不向四处拼命地抓攫。问题不在于他所抓到的理论是否系统、准确，而在于应用这种理论时是否切合对象的自身情况。倘若急功近利，那么，这种理论未免有些教条。这时候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较陌生的，但他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认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实之门。

《“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创造社的诸位大为恼火，成仿吾立即回文，在《毕竟“醉眼陶然”罢了》中，成仿吾挖苦道：

“听说堂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它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

他的眼膜，‘竟像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

……

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 Don Quixote 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起劲，但是。他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出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成仿吾把鲁迅指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他认为鲁迅不仅思想是陈腐的，而且人格也是卑污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像鲁迅这种人，已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仿吾觉得，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推翻鲁迅式的思想模式，用苏联式的革命武器去建设新的文化天地。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旧的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了。

攻击鲁迅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叶灵凤还在杂志上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对这些人身攻击的文章，鲁迅已不觉得新奇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和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和回击。

在攻击鲁迅的文章里，郭沫若是最锋芒毕露的。他在这一年《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风极不友好、笔触相当刻薄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把鲁迅看成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他认为鲁迅对现代世界是隔膜的，鲁迅的思想、爱好、审美情趣无不与封建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了解的鲁迅，当然也不会了

解无产阶级的观点。鲁迅对“革命文学”提供者的回击，证明了他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坛的落伍者。于是，郭沫若总结说：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

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绪代替了政治意识，他对鲁迅的著作所看甚少，仅凭一点印象，就信口开河，这完全是一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批评态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撑郭沫若的有时是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和直觉，他的缺少理性的草率之作，客观的说，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在重重的围击中，鲁迅的心境确实是不好的。他一方面抓紧学习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击来自文坛上的冷枪暗箭。

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理论上的纠纷日益明显，鲁迅陷入了更深的包围之中。

在尖锐的对立中，对方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有人对鲁迅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打起主意，批判者说鲁迅态度苛刻、心胸狭窄，缺少大将风度，甚至拿他的籍贯、家族当作奚落的资料。鲁迅被这种卑劣的手段所激愤，一连在《文坛的掌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里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他的文章也夹杂着逼人的讽刺意味，对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思想、文艺观进行了反批评。

鲁迅认为成仿吾等人的文风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也难以立得住脚。例如，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时，把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无边的夸大了，这种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尚不配具有文学的资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述，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的结束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鲁迅的文章是带有辩证因素的，他在声势浩大的新文艺思潮的袭击中，没有被新奇的事物所吓倒，反而以自己的机警、聪慧，道破了对手的矛盾。的确，在回击对手时，鲁迅也时常无情地嘲弄过这些盛气凌人的青年人，他那冷酷地解剖别人和解剖自己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留面子的笔锋是招惹是非的因由，但他始终认为，在现实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哪怕暂时受到更多的委屈。

这一年，钱杏邨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长篇评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这是这一年双方争论之中，左翼青年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从鲁迅小说的时代背景、创作动因、个人气质以及当代意识几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鲁迅的小说除了《狂人日记》表现了一点对礼教的怀疑，除了《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了《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的创作没有一点现代意味。鲁迅属于遥远的过去，属于无光无爱无幸福的世界，而不属于激荡变化的现在。鲁迅所展示给人的，是绝望与痛苦、哀伤与苦闷，是麻木的、灰色的人生，而不是光明与希望。因此，尽管鲁迅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人物的悲观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没给人们留下一丝的快乐。鲁迅的这种看不见人生出路的思想情绪，一定程度制约了他的发展。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地前进的情况下，鲁迅只能被新的时代所抛弃。

这位青年学者甚至认为,鲁迅笔下的阿 Q 时代,已永远的死去了。

“《阿 Q 正传》虽有这么多的好处,在表现与意义两方面虽值得我们称赞,然而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 Q 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 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 Baudon 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 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 Q 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 Q 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说到这里,我们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

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 Q 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 Q 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 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 Q 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 Q 埋葬起来!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 materials,我们是永不需要阿 Q 时代了!……”

钱杏邨在文章中还认为,鲁迅没有一丝政治思想,他与政治不发生关系,闭着双眼是不会感受到革命形势的。作者把鲁迅反驳成仿吾等人的文章,看成是鲁迅否认革命文学的必然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实在是富于保守性的,不然,为什么一年以上的刊物就不能转变方向,而必须维持以前的态度呢?这可以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此外,我们在鲁迅的著作里,究竟还能找到些什么?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看

其他作家的文章时，却并没有忘却，甚至努力的有意的硬把他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着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来泄泄他的愤。”

在作者看来，鲁迅不仅没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充满了敌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因而，他最后说道：

“现在的时代，已不是这样的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果能接受批评，翻然悔悟，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还不迟。错误的改正不是一种羞辱，任性没落，却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请再看鲁迅以后。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他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

《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围剿鲁迅的文章中最有理论性的论文，对鲁迅的思想的复杂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这比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观点更系统。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人们就会发现，钱杏邨在写此文时，完全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演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而没有切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之中。他仅仅从政治上热情地讴歌了农民革命的行动，而没有仔细分析农民心理的内在结构；仅仅从苏联的理论中套用几句公式，而忽略或抹杀中国的现实形态的实质内容。钱氏在文中输入的只是苏联革命的概念，而不是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结构的关注。如果说，在当时这种观点能够起到使人们超越自我的鼓动作用，还不失一篇富有激情的文化上的宣言的话，那么，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心理的状态来看，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价值。因为它是青年文人被异国的新的理论吸引后的一种情感冲动的产物。它既缺乏现实性的根据，又不具有深沉的情感体验后的理性总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面临的，是一群操持新鲜的理论而又不谙熟中国国情的偏激青年，他们在理论上对鲁迅的狂轰滥炸，除了在客观上促使鲁迅去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外，几乎没有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在被围剿的日子里，鲁迅抽暇购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他认真读读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以便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获得普遍注意的原因所在。鲁迅还挤出了时间阅读来自苏联的理论著作，对过去争论中尚存在模糊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对这些新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确信，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们，并没认清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他们只不过把这些舶来品生硬地套过来而已。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辩使鲁迅进一步相信任何外来的东西，倘不针对中国的现实特点，就不会给中国的改变带来丝毫益处。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具体地分析了左倾主义文学观失之偏颇的根源，这些观点成为鲁迅实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思路一贯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来阐释问题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相信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远远超过相信来自先验理性的各种信条，他的思维方法在许多地方呈现出辩证的因素来，因而在他的观念中，所有的远离现实的超时代的认识论，都不具有现实的价值。但是鲁迅并不因此而摈弃这些带有生气的外来思想体系，他总是认真思考这些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交汇点，并不断从中获得新的思路。

鲁迅思想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三〇年的五月七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文中说：

“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于巴尔底山(Por, itan)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有如此者，现据热于文艺界消息表的朋友说，张资平也不堪其骂，近已输诚投降了。据说，他俩为了要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能不要和他们要好，共同一致，于是共产文艺政策宣告成功，而文艺前途不知黯淡无光于何时了，啊！为什么不淫不移不屈之士，这么难见于今世？我在鲁迅先生没有醒觉时，深深为之惋惜，不能不痛心地写了一篇鲁迅被共产党屈服。”

“男儿”认为鲁迅的转向是他的人格悲剧，他的这种观点，在文坛中有一定的

代表性。鲁迅思想的变化使许多中间人物和右派文人感到惊异。如果说鲁迅早期的偏激思想他们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使许多人认为这是投降的表现。他们觉得鲁迅误入了歧途,其思想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偏差。新月社的一起人,都不同程度对鲁迅持这种观点。还是在一九二九年,梁实秋针对鲁迅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以及这些理论所表述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批评了鲁迅等人的观点和表现,一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的争论随之而出现了。

梁实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古典的人道主义,它提倡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道德准则,对偏激的非理性情绪甚为不满,主张回到古典文艺的怀抱中去。梁实秋的审美思想属于这一思想体系,因而他主张纯粹的人性的东西,而全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梁实秋的批评尺度完全来自于西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具有浓郁的书斋性,这些纯粹的理性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温和的理想主义的幻像,它一旦与血的现实相结合,就显得格外苍白了。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中,回答并批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的观点。鲁迅不但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认为在中国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时代,高唱人道主义的调子,其实质是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鲁迅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神话会给中国带来希望,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而已。从个性主义的反抗意识,到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鲁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些接近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其一贯的战斗精神,开始蒙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鲁迅在各种文化势力的围剿中,最后选择了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的道路。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不管人们怎样猜疑他的动机,有一点人们是不能不承认的,孤独的鲁迅需要一种团体的力量,一支庞大的反抗旧势力的队伍。他不再计较以往的得失,与许多热血青年们组成了联盟。一九三〇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诸人团结起来。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鲁迅被推选为主要的领导人。从这时起,他组织并领导了左联的反抗政府当局的文化运动。

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期,谣言、通缉令、暗杀充塞着上海滩。二十世纪的中